



陈介祺与郑板桥的翰墨情缘

◎朱建霞

在位于潍坊市十笏园文化街区的郑板桥纪念馆中,有郑板桥在审理案件时的判词判牒的图片。这些原物被后世收藏至今,不但具有高超的书法艺术之美,还“情理法”兼具,礼顺人情,又符合律意,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位先贤对公正与良善的不懈追求,以及对社会正义的深度思考。

有意思的是,这些藏品部分曾是金石学家陈介祺的收藏,这位大收藏家在赏鉴之余,甚至在藏品上留下了自己的解读,内容不乏对郑板桥情怀、人品和智慧的欣赏。

细看郑板桥在各类纠纷或案件等问题所作的批示,这些批示充分反映了其爱民、恤民、为民分忧、为民做主的情怀,彰显了他灵魂深处真实的拳拳赤子之心。遗存下来的批示判词等,以独特的书法魅力、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悲悯情怀,赢得了后人的赞誉,陈介祺便是其中之一。

陈介祺,作为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,他对郑板桥书法与文学的欣赏,不仅仅体现在对这些判词判牒的精心收藏上,更在于他从中汲取灵感,将自己的金石研究与郑板桥的艺术风格和人品高度相融合,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韵味。郑板桥,这位清代著名的书画家、文学家,在潍县主政期间,县志记载:“无留牒,无怨民”“囹圄囚空者数次”,他办案勤勉公正,在任期间无积案、无冤案,这样的治理能力和业绩实在难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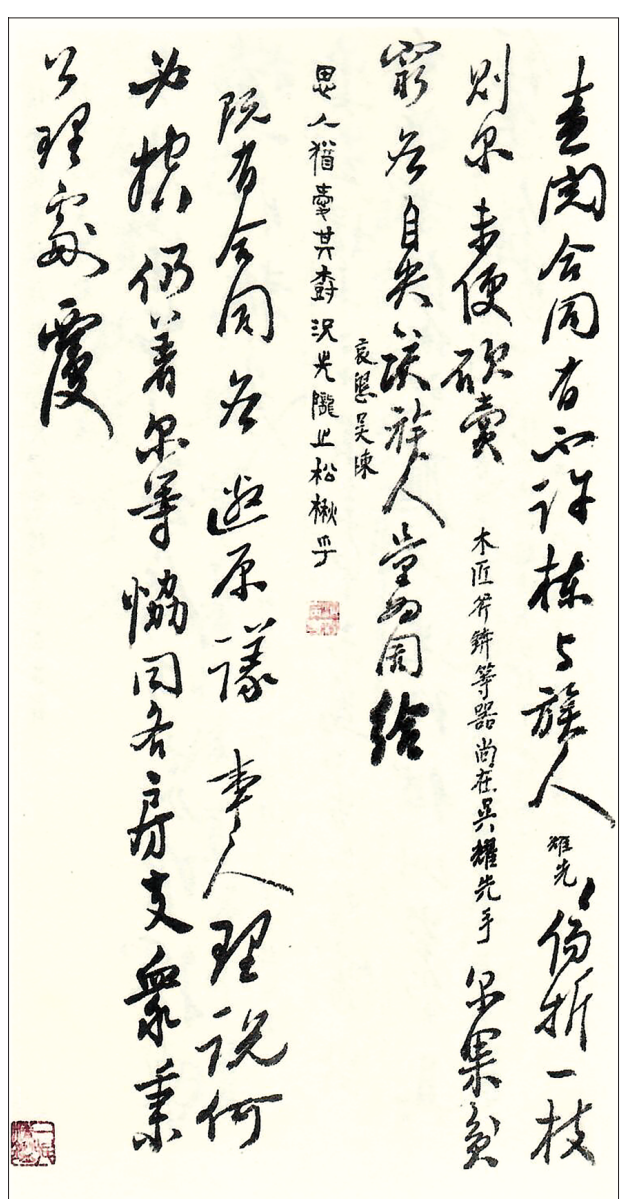
郑板桥因其书法作品声名卓著,他在潍县担任县令长达7年,离任后,其审理案件的判词,有一部分被人们作为书法珍品保留下来。清光绪年间,这些珍贵的郑板桥手批诉状书法作品开始在民间流传,成为收藏家们争相收藏的宝贝,有的甚至流传到了日本。在收藏界,这些作品被称为“郑板桥判牒”。据统计,郑板桥在潍县县令任内处理的案件的批示、判词、判牒,目前在收藏界已知的大约有四百件,内容涵盖了婚姻、财产、土地、坟茔、风水等多种类型的案件。

光绪四年(1878年)的一天,陈介祺在潍县十钟山房,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卷新得的郑板桥判词。纸色已呈深褐,墨迹却依然力透纸背,八面出锋。这是郑板桥知潍县时亲笔所书的田产纠纷判词。在这一瞬间,时间的长河似乎变得柔和而亲切,伴随这位晚清时期的金石巨匠,在历史的深处,挖掘并展现那位康熙秀才、雍正举人、乾隆进士的官德风范和悲天悯人的情怀。

感动之余,陈介祺提笔写下跋语:“板桥先生以文章之秀发于政事,吾邑贤令尹也。片纸只字,人皆珍之。四方亦于潍求之。遂日以少矣。此批牒十一幅,亦将入历以余所知附题数语。田间归来,视卅季肯或少亲切耳。”并盖上“海滨病史”和“齐东陶父”两方篆文印款。

陈介祺盛赞郑板桥为“吾邑贤令尹”,流露出他对这位家乡父母官的才华与人品的深深敬仰。这些情感上的共振,如同跨越时空的对话,连接起两位文化巨匠,共同诠释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。

一禀一批见情怀。郑板桥的批词判牒不是寻常的公文。那些刚柔相济的墨痕里,既有“衙斋卧听萧萧竹,疑是民间疾苦声”的忧思,又有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倔强。



郑板桥判牒(资料图片)。

陈介祺的收藏中,一件关于祭祀所用牛的判词尤为精彩:郑板桥以“私宰奉禁,那得牛行贴?并本县捐廉买牛致祭可耳”。这些文字从公案流向民间,最终汇入了陈介祺的十钟山房。

在潍县陈家的藏书楼里,郑板桥的判词与毛公鼎拓本比邻而居,与周鼎汉印同贮一室。这恰似两个灵魂的并置,一个是将篆籀笔意化入行草的县令,一个是把金石考据做到极致的大收藏家。

陈介祺收藏这些判词时,必定在灯下反复摩挲。他在考释毛公鼎铭文时积累的目鉴经验,此刻正用于品评判词中的笔墨意趣,精彩之处,他忍不住抒发情怀。那些关于各种纠纷的判词肯定让陈介祺思索良多。

在处理集市摊位管理及节日公平交易的规定批示时,郑板桥这样写道:“各集贴,并非可为例,嗣后每逢祭期公平买卖可也。仍不准,约地于证查处复。”每个集市的摊位,不是说每次都可以这样,以后每逢祭祀节日,公平交易就可以了。若仍然不允许,请地方官员和证人调查处理并回复。陈介祺赞叹:“稽而不征,方不扰民而各得其所。”检查而不征税,这样就不会打扰民众,大家都能各得其所,互不打扰。当这位大收藏家在上面批阅时,他实际上是在为郑板桥的为民

情怀“点赞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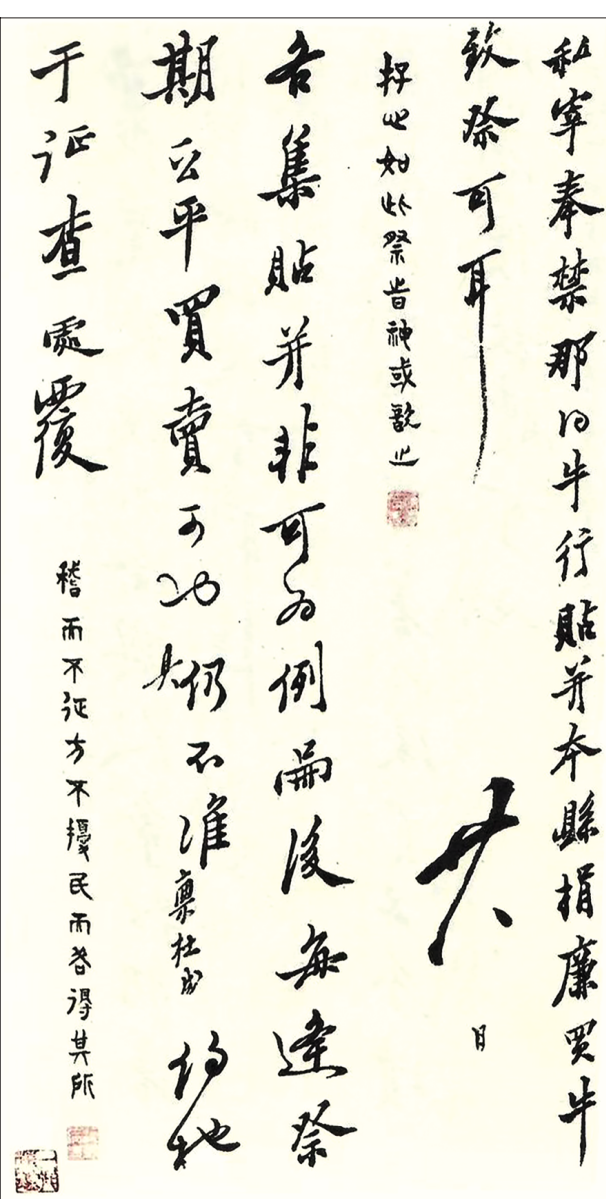
二人之间这些有趣的缔联,跨越了时间的长河,将两位大师紧密相连。在另一桩涉及砍伐墓地树木的案件中,郑板桥以简洁明了的语言,既维护了法律尊严,又兼顾了人情世故。他写道:“查阅合同有不许栋与族人伤折一枝。则尔未便砍卖。尔果贫穷,应自央该族人量为周给。”陈介祺读后,不禁感慨:“思人犹爱其树,况先陇之松楸乎。”他对郑板桥既严明法度又不失温情的做法,深深敬佩。

在这些判词中,郑板桥不仅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学功底,更体现了他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关怀。他深知百姓生活之不易,因此总是力求公正与仁爱并重。而陈介祺,这位金石大家,在这些判词中读出了郑板桥的另一面——一个心怀苍生、体恤民情的父母官。

两人的灵魂,在这些泛黄的纸张间,悄然共鸣。

陈介祺旧藏中有一件关于郑板桥在处理婚姻纠纷时,反对以金钱来干预青年男女婚姻的信件。在判词中,有一女方家庭嫌未婚女婿家贫,欲毁弃婚约。郑板桥判以“不准”。判词:“尔女十五,婚年二十岁,年甲未为不当,亦难申断分拆,业经做亲,应成连理,彼此当堂具。销案判。”

陈介祺在边上注道:“户昏田土不



能公允,则酿大案而入刑名。教化风俗阴鹭,俱存乎此。刑则法不可枉,不可纵而已。刑期无刑,辟以止辟,圣人所以杀人而当谓之仁也。”如果处理土地和婚姻问题不公平,就会引发大问题,甚至牵涉到刑事案件。教育和风俗习惯的改善,都取决于这些事情的

处理。法律不能被滥用,也不能放纵犯罪。法律的目标是达到没有犯罪,通过惩罚来阻止犯罪。

薄薄的纸片,承载着两位文化巨匠的精神交流。作为著名的大收藏家,陈介祺不仅欣赏郑板桥在书法与绘画上的造诣,更钦佩其在司法实践中,展现出公正无私与人文关怀的一面。

陈介祺对郑板桥判词的收藏与阐释,构建了从艺术审美到社会史研究的完整学术链条,使原本可能湮没的地方司法文献,最终成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“情、理、法”互动关系的经典文本。

时光流转,这些承载着两位大家思想和风骨的判词判牒,有的藏于博物馆,有的为私人收藏,有的漂洋过海成为异邦馆藏,无论何处,都是中国文化血脉里动人的篇章。它们静静地诉说着历史,传递着智慧,让后人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风貌与精神。它们超越了时间的限制,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,让后世学者与民众在品味中感悟,在感悟中成长。

尘封的广国

◎崔斌 文图

《汉书》记载,广县曾是西汉的侯国。汉高祖六年(公元前201年),召欧被封为广侯,食邑二千二百户,封地在齐郡的广县,也就是现在的青州市。因为召欧受封,广县升为广国,广县故城也称为广国故城。《山东通史》里记载:“广国,国治今青州西南,侯国。”

2007年,青州城南九龙居小区施工,工程到了角楼村瀑水涧时,发现了一座大型“甲”字型汉代墓葬。这座墓是一棺二椁,墓道朝南,墓室一层层向内收。不过这墓历史上多次被盗,规模虽大,清理出的随葬品不多。这就是后来认定的召嘉墓。其中较精美的是铜铺首衔环和“召嘉”铜印,现在都在青州博物馆。

这对铜铺首衔环出土在外椁壁靠近墓道的地方,高27厘米,两个共重约10斤,都是青铜做的,能分开,这点挺特别。铺首是怪兽头部造型,以鼻梁为中线,两侧纹饰对称。怪兽戴“山”字形冠,眼睛突出,鼻梁下是大张的嘴,尖牙从嘴角露出并上卷,嘴里衔着铜环。铜环又宽又圆,表面没花纹。铺首正面用阴线刻斜条纹表示眉毛、头发等,刻线很细。背面有竖长方形椎钉,用来固定在棺木上。这对铜铺首衔环能用来提携下棺,和墓葬规制一样,是墓主人权力地位的象征,因为形制大又在棺椁附近,应该是运送或下葬时抬棺椁用的。

墓葬里还有西汉“召嘉”印,铜质,顶部是盖顶,有瓦形穿带钮,印面方形,边长2.4厘米,通高1.6厘米。印面篆刻的“召嘉”二字很清楚,据推测是西汉第三代广侯召嘉的印信。

召嘉墓还出土了一批陶制品,有彩绘陶盆、彩陶壶、陶熏炉、陶耳杯、陶酒盅和陶匋。以彩陶壶来说,很普通,纹饰也简单。汉高祖时期已有厚葬传统,召嘉墓虽经多次盗掘,文物不多,但仍能看出这位侯王的墓葬比较俭朴。

在广县城遗址瀑水涧一带还发现了汉跽坐胡俑,是典型胡人形象。据记载,两汉时广县城封侯的只有第一代广侯召欧跟随刘邦征战,胡俑发现地离召嘉墓不过几百米,推测胡俑的墓主人是召欧。这胡俑高3米左右,戴尖顶帽,帽边饰穿壁纹,脸长,眉骨突出,深目高鼻,两腮略残,下巴尖窄。他穿紧身袖衫,双手交于胸前,系着有穿壁纹的腰带,下穿紧腿裤,双膝并拢,两脚压在臀下,脚心向后,是跽坐姿势。

广县城是青州历史上第一座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城池,但它的准确位置甚至是否真为城池,一直有争议。“召嘉”印的发现,对确定广县城位置,研究汉代青州历史和广侯沿革很有意义。

后来专家考证,广县故城遗址在凤凰山路以北、南阳湖以南,瀑水涧以西,下圈村以东,被定为潍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考古勘探发现,广古县城占地约400亩,居民规模较小,大概主要是官宦贵族和奴仆,平民住城外。古城下还有厚厚的古文化堆积,最早是大汶口文化。不管怎样,汉高祖建汉后在这设县,还把立有功战的召欧封到这。

召姓很少见。《通志·氏族略》记载,召姓源自姬姓,为燕国王族后裔。公元前222年燕国被灭,王族子孙避难,多以召为姓。

有研究认为,召欧是刘邦认识的人,可能不亲近,但肯定认识。他凭着这个身份加入刘邦的队伍,刘邦的军队攻入关中到霸上时,召欧任连敖。连敖级别不高,相当于刘邦的护卫,负责安全保卫,也替刘邦处理事,见人。

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里,召欧有明确的定燕功绩。大将军韩信派燕国王族后代召欧当使者,说服燕王臧荼投降。就靠这功劳,召欧升为将军,后来封侯也凭这个。

广侯国传承了40多年。第一代广严侯召欧在位23年,第二代广戴侯召胜在位9年,第三代是召胜的儿子召嘉,汉文帝前元十一年(公元前169年)薨爵,在位13年。这一脉没后代,侯国就撤了。

从召嘉墓出土文物看,没有特别豪华的,和西汉王侯的排场差得有点远。别说西汉海昏侯墓出土十余吨铜钱和大量金器,就是西汉第二代齐王刘襄的墓,也清理出5个陪葬坑,出土文物多达1.2万余件,有金银器、铜器等,其中有不少珍品。汉代讲究视死如生,异姓列侯和刘姓皇族差距这么大,连壶都是陶的,这能看出汉代帝王对分封侯王的态度。也从侧面反映出,刘邦等汉代皇帝对功臣心存防范,厚此薄彼。

如今,来到广县故城遗址,回望广国的历史,仍让人感慨不已。



“召嘉”印。



召嘉墓出土文物。

非遗是生活

高密半印半画年画



《年年有余》(资料图片)。

清嘉庆、道光年间,高密年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,出现了半印半画。据传,当时在天津杨柳青画店工作的胡三,因生计所迫,从杨柳青辗转到低密李家庄,投靠在“增顺”胡玉显门下。胡三师从胡玉显后,融会贯通,很快把杨柳青年画的长处糅进了扑灰年画中,形成了高密半印半画制作技术,摆脱了纯手工绘制约束,大大提高了年画生产效率,也促进了刻版业的发展。这时期涌现出了许多颇具规模的画子店,如:增盛、立兴、齐万顺、吕记画庄。画子店的开张,引来了大批画子客,特别是秋冬季节,他们争相贩运,半印半画年画远销海阳、临沂以及江苏、东北、内蒙古等地。

这一时期的年画题材品种也丰富多样,不断创新,风格迥异,许多艺人还兼画扑灰年画和木版年画。高密扑灰年画和半印半画相互渗透,互为促进,共同发展,迎来了高密年画的鼎盛时期。到清朝末年,北村的“同顺堂”“余庆堂”

“齐万顺”等画店,为了提高经济效益,又在扑灰年画、半印半画的基础上,发展了全色套印方法。

高密半印半画年画是以刻版印线稿,再进行手工填绘的一种民间画种。所刻线版大多沿用扑灰年画原手描图样刻成,取代了扑灰年画当中的“扑灰”“勾线”等工序,填绘与扑灰年画的画法大同小异;它摆脱了纯手工绘制的约束,大大提高了年画的生产效率。

高密半印半画年画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:造型上追求尽善尽美,画面人物完整;画中有意,多用隐喻象征手法,如用飞舞的蝙蝠隐喻“福在眼前”;主要人物突出,次要人物较小,在画面上大小对比强烈。其创作题材广泛,不仅表现日常生活的人和事,而且包括了神像类、戏曲人物类、人物传说类、山鸟花卉等多种题材。

(据《潍坊文化遗产·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卷》)